



世纪文库

中国文学精神

徐复观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国文学精神

徐复观 著

世纪出版集团 |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精神. 徐复观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3

(世纪文库)

ISBN 7-80678-472-1

I. 中... II. 徐... III. 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58301号

策 划: 彼岸出版策划室(汪宇)

特约编辑: 姚大勇 黄曙辉

责任编辑 阙 政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 多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中国文学精神

徐复观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35.5

字 数 425,000

版 次 200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78-472-1/I·48

定 价 50.00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自序 一 [1]

这里印出的八篇文章，前面七篇都曾在刊物上发表过，此次只对文字稍加整理。最后一篇——《中国文学中的气的问题》——则系十年前已经预定要写的，可是因偶然的机缘，在这一方面写了十多万字，但预定要写的反一直拖了下来，拖到本书汇印的前夕，才仓促提笔写成。即此一端，也不难想见我的生命，给偶然的机缘消耗得太多了。

从民国十五年起，受当时革命浪潮的冲激，一直到民国三十四、五年，我完全摒弃了线装书，尤其是摒弃了宋明理学和桐城派的古文。但当无聊的时候，还读读诗词，以资消遣，因此，也特别留心到中国文学史这方面的著作，中、日有关这类出版的东西，总是尽量收集。到抗战发生为止，所收集到的，都毁于民国二十八年日机对重庆的一次轰炸。等到我认识了熊师十力，而自觉到过去对中国文化的卤莽愚妄时，在诗词及文学这一方面的兴趣，反而淡漠起来了。现在，进入到我心灵最深的，却是我过去所摒弃最力的宋、明这批人格主义的思想家。并且十多年来，也慢慢地重新了解所谓桐城派古文，在中国文学史中必然要占崇高的一席。我之所以用“重新”两个字，说来真是惶恐，原来我在二十一二岁以前，湖北的几位老先生，也是我的恩师——王季芑、刘凤章、黄翼生、李希如、孟晋祺诸位老先生，都认定我会成为此中的能手。谁知垂暮之年，却只落得一双白手呢！

友人牟宗三先生，看到我偶然写的这方面的文章，曾来信郑重地要我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并认为假定我肯写，定和我目前所写的《中国艺术史》——即现时付印的《中国艺术精神》——同样有价值。因为我的《中国艺术精神》中的一部分，牟先生曾经看到过。不过，

[1] 《中国文学论集》初版自序——编者。

目前中国文化界的趋势，和民国十五年以后的二十年间的我一样，正以卤莽愚妄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文化，但在文学这一方面，还有些人感到兴趣。只要感到兴趣，总会慢慢地弄出点头绪出来。此后的余年，倘再能写几篇文学方面有关键性的文章，便已经不错了。恐怕不容许我把写一部值得称为《中国文学史》的时间，安排到自己也不能完全控制的未来的日程里面。

每门学问都有它自己的世界，这即是一般所说的学术的自律性。目前所以不能出现一部像样点的《中国文学史》，就我的了解，只因为大家不肯进入到中国文学的世界中去，而仅在此一世界的外面绕圈子。有的人，对于一个问题搜集了许多周边的材料，却不肯对基本材料——作者的作品——用力。有的人，对基本材料做了若干文献上的工作，却不肯进一步向文学自身去用力。所以在这类文章中，使人感到它只是在谈无须乎谈的文献学，而不是谈文学，不是谈文学史。在某一文献本身有问题时，谈谈文献学，当然是需要的。在没有文献问题的典籍中去大谈而特谈其文献学，便只有把文学驱逐得更远了。至于抄袭剽窃之流，又何足论。

上述情况，除了以派系霸占地盘，维持饭碗，破坏了整个学术研究风气的原因之外，切就文学史的本身而论，我想还有三个原因，会妨碍这工作的进展。第一，研究文学史的人，多缺乏“史地意识”，常常是以研究者自己的小而狭的静地观点，去看文学在历史中的动地展出。不以古人所处的时代来处理古人，不以“识大体”的方法来处理古人，也不以自己真实地生活经验去体认古人，而常是把古人拉在现代环境中来受审判，拉在强刑逼供，在鸡蛋里找骨头的场面中来受审判，拉在并不是研究者自己真实地生活经验，而只是在自己虚骄浮薄的习气中来受审判。我年来发现，有的人写文章的目的，似乎是在造成历史地冤狱，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抬高自己的地位。第二，“凡属文言的作品便是死文学，只有白话的作品才是活文学”的口号，使文学史中，惟有俗文学才受到文学地待遇。五十年以前，每一时代的文学主流，便实

际都受到“非文学”地待遇。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是通过文学作品以发现有代表性的心灵活动，及在此活动中所真切反映出的人类生活状态的历史。只有在值得称为“文学的作品”中，才显出人类的心灵活动。文言、白话的自身都不是文学，所以文学也无间于白话与文言。不能在文言中发现文学，也决不会在白话中发现文学。不能发现文学，如何能发现“文学的历史”？第三，进化的观念，在文学、艺术中，只能作有限度的应用。历史中，文学、艺术的创造，绝对多数，只能用“变化”的观念加以解释，而不能用“进化”的观念加以解释。可是时下风气，多半把个人的文学观点，套上未成熟地进化观念的外衣，无限制地使用，结果，文学史中十之八九的人和作品，都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变成了过时的废料。有的朋友讽刺我的兴趣太广。也许正因为这一缺点，而使我能从各种角度去了解文学、艺术，去承认文学、艺术多方面的价值。除了是虚伪的东西。

我这本书，在性质上，若套用日本常用的名词，应当和同时印出的《中国艺术精神》，称之为“姊妹篇”。但我不愿这样说，是因为《中国艺术精神》系计划地、有系统地一部书，而本书汇印的八篇文章，并非出于预定的计划。虽然如此，但当我因偶然机缘的触发而拿起笔来的时候，还能保持严肃的态度。假定这几篇文章，对下一代好学深思之士，在文献考证及思想把握的态度与方法上，能发生若干启发性的作用，我便非常满意了。其中错误之处，定所不免，我恳切希望能得到指教。此外我还写过不少的有关文学、艺术的短篇文字，但多以介绍西方者为主，将来预备收印到我的杂文集中去。

友人朱龙鑫先生，隐于下吏，书画双绝，人品尤高，本书封面（指台湾学生书局版《中国文学论集》的封面——编者）的检书，是他为我集的汉碑，至可感谢。

一九六五年十月四日徐复观自序于东海大学寓庐

自序二^[1]

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也有相当的理解。这些年来，所以把研究的精力倾注到中国思想史方面，完全是来自对中国文化的责任感。但因偶然的机缘，仍情不自禁地写了些有关中国文学方面的文章，这里补编的十六篇，是自己觉得比较有点意义的。

《西汉文学论略》，是一篇披荆斩棘性的文章，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应当有若干贡献。但其中也犯了些错误，借此次汇印的机会，把它改了过来，好像放下了精神上所压的一块石头。

以《文心雕龙浅论》冠名的七篇文章，再加上《释诗的温柔敦厚》的一篇，都是为《华侨日报》“中国文学双周刊”写的，因篇幅限制，不得不出之以凝缩的方式。但此次重看一遍，好像是看他人的文章一样，感到不是把精神完全沉浸下去，决无法写出。有志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也应当把精神完全沉浸下去阅读。另有两篇讲演纪录的短文，都是针对一个问题所提出的浅显看法，对青年也许有点帮助。谈中国文学中想象问题的两篇文章，似乎可以当“深切著明”四个字。

有关《红楼梦》的三篇，应当引起读者更大的感想，即是，百年来我们在文史上一片空白的最基本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似乎可以得到一点解答。还另有答复对我提出反诘的三篇文章，因反诘得愈来愈离谱，所以答复的也没有实质的意义，便不应再糟蹋纸张了。对《文心雕龙》和《红楼梦》，还有预定要写的文章，日暮途远，我能许下什么愿心呢？

癸丑年（一九七三）十月廿七日记于九龙

[1] 这是徐复观先生为《中国文学论集》再版补编所作自序——编者。

自序三^[1]

一

这里收录的几篇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并不够印成一部书。去岁在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割治胃癌后，自知生命快要结束，于是把未曾汇印过的杂文，交给陈君淑女及曹君永洋，请为我编成杂文续集及外集。把未曾收印到《中国文学论集》中的几篇文章，在养病中重阅一过，有的稍作补充，另外为了纪念友人唐君毅先生，更补写了一篇，一并交给薛君顺雄，请为我编成《中国文学论集续篇》，并将几篇用文言写的文章和若干首诗，附录在后面。其他未成熟的讲稿及《论》、《孟》、《老》、《庄》的零星札记，预定在断气前再赠送与愿意保存的人。古人有自营生圻，作为身后善后的。即使我有此雅兴，也没有这份力量。残稿的安排处理，大概就算是为自己所办的善后了。

我颇能论诗，但不能做诗。做诗不仅要多读多做，下一番勤苦锻炼的工夫，并且诗人的精神状态和学人的精神状态，并不完全相同。诗人是安住在感情的世界。他们的理智活动，或因觉其与生命的疏外而随时加以抛弃，或因其对生命的深入而又化归为感情。诗人常以欣赏咏叹的心境来读书，所以读书不求甚解，但也常由欣赏咏叹而能对书有所得。他们与对象的关系，是相融相即的关系，对于对象的表达，是在感发咨嗟中，把对象唱叹描绘出来，越唱叹描绘得入神，越含有作者的性情和面影。学人是安住在理智的世界。他们的感情活动，或因觉其对生命是一种纠缠而加以抑制，或因其对生命的浸透而运用理智来加以处理。

[1] 这是徐复观先生为《中国文学论集续篇》所作自序——编者。

学人是以钻研揭露的心境来读书，读书必求甚解，也常因钻研揭露而对书才有所得。他们与对象的关系，是主客分明的关系，对于对象的表达，是在冷静分析中把对象解剖条理出来，越解剖条理得入微，越能显出对象所含的原理、法则。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两种精神状态常常能作并且也常常会作自由的转换，但并不是诗人由感情世界转换为理智世界时即可成为学人。同样的，并不是学人由理智世界转换为感情世界时便能成为诗人。转换之后，必须继之以各自不同的工夫，才可得到各自不同的成就。我少年有天资而无志气，中年役精疲神于国政攻取之场，晚年治学，自然走上学人所走的路。我是不会做诗，偶然做一首两首，也多不成熟乃至不合规格，乃必然之事，所以随做随丢，不值得爱惜。此次把偶然记得，及金君达凯为我从《民主评论》上抄录下来的，不惜自曝其丑，附录刊布出来，也是在“善后”的心境中，留下渺小的人生脚印。其余失散的，只好听其随声尘而俱归泯灭了。

二

我从一九五〇年以后，慢慢回归到学问的路上，是以治思想史为职志的。因在私立东海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时，没有先生愿开《文心雕龙》的课，我只好自己担负起来，这便逼着我对中国传统文学发生职业上的关系，不能不分出一部分精力。偶然中，把我国迷失了六七百年的文学中最基本的文体观念，恢复它本来的面目而使其复活，增加了不少的信心。我把文学、艺术都当作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来处理，也采用治思想史的穷搜力讨的方法。搜讨到根源之地时，却发现了文学、艺术有不同于一般思想史的各自特性，更须在运用一般治思想史的方法以后，还要以“追体验”来进入形象的世界，进入感情的世界，以与作者的精神相往来，因而把握到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便超出我原来的估计，实比治一般思想史更为困难。可惜我的精力有限，在艺术

方面比较有计划、有系统的写了一部《中国艺术精神》，但在文学方面，到一九六五年为止，仅写了八篇文章，汇印成《中国文学论集》，以后每重印一次便增加若干文章，到一九八〇年的第四版，长长短短的，共增加了十六篇，由原来的三百多页，增加到今天的五百五十七页。

一九六九年秋季，我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担任客座教授。据唐君毅先生告诉我，听我讲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学生，在人数上打破了过去纪录。但我发现，对许多问题，我与唐先生及牟宗三先生的看法，并不相同。为了预防由看法不同而引起友谊上的不愉快，我便要求转开以中文系为主的课，把我的名字也转到中文系，虽然继续开中国哲学史的选课，一直到新亚书院离开农圃道为止，但这中间重新开了《文心雕龙》的课。新亚研究所脱离中文大学独立后，学生人数少，中国哲学方面由唐、牟两先生负责，唐先生要我专开“《文心雕龙》研究”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我也想借此机会，写一部像样点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但为了写《两汉思想史》，费了六年以上的准备时间。到香港时，初步的准备工作刚刚成熟，若再不动笔，等于前功尽弃。而可以利用作写学术专文的时间，在上课期间，只能抽出两天或一天半，此外便靠寒暑假。我还不断为《华侨日报》写时论性的文章，去岁印成杂文四册。还因兴趣而参与过《红楼梦》的讨论，及引起有关黄公望两长卷山水真伪问题的一番热烈讨论，加上其他有关作品评鉴的文章，总共写了十多万字。这样一来，香港十年，学术上除印行了《两汉思想史》三册，及可作为《两汉思想史》分册的《〈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一书外，在中国文学批评方面，只有一、二、三三次的简单而未成熟的讲稿，及一九八〇年加印到《中国文学论集》四版中的十六篇文章。我常常忘掉自己的年龄，还想在《两汉思想史》告一段落时，也用独立论文的方式，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选择若干关键性的题目，写成十篇左右深入而具纲维性的文章，以完成这一方面的心愿。及去年八月在台北发现胃

癌后，知道这一切已成梦想。《续篇》中所收《陆机〈文赋〉疏释》及《宋诗特征试论》，是计划中的一部分。今后假定还能侥幸多活几年，按原定计划再写几篇，加到《续篇》的再版中去，那便太幸运了。

三

写这方面的文章，同样应当注重有关资料的收集，这一点，早为时贤所注意。但在这里想特别提出的：每门学问都有若干基本概念，必先将有关的基本概念把握到，再运用到资料中去加以解析、贯通、条理，然后有水到渠成之乐。中国著作的传统，很少将基本概念，下集中的定义，而只作触机随缘式的表达。这种表达，常限于基本概念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的意义，必须由完善周密的归纳，虚心平气的体会，切问近思的印证，始有得其全、得其真的可能性。否则或仅能涉及文学周边的若干故事，而不能涉及文学的自身，一涉及文学的自身，辄支离叛涣，放弃自己的立场反成翳蔽，甚至把自己的意思去代替古人的意思。我曾看到某学术机构出版一厚册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对原著的基本概念，及由基本概念所形成的结构、系统，毫无理解，却代刘彦和安上许多项目，标出许多名称，不知道把问题扯到什么地方去了，真令人难以忍受。我的文章，或者在这方面有点贡献。错误的地方，希望能得到指教。

薛君顺雄，性格纯厚而通达，在这方面所下功力之深、积累之富，远在我之上。我想达到而未能达到的愿望，只有寄托在他身上。他为《续篇》的编校尽了许多心力，我想这不应仅是师生间深厚感情的纪念。

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徐复观序于休士敦客次

目录

自序一 / 1

自序二 / 1

自序三 / 1

传统文学思想中诗的个性与社会性问题 / 1

儒道两家思想在文学中的人格修养问题 / 6

释诗的比兴——重新奠定中国诗的欣赏基础 / 22

释诗的温柔敦厚 / 43

诗词的创造过程及其表现效果——有关诗词的隔与不隔及其他 / 47

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试评——中国诗词中的写景问题 / 64

中国文学中的想象问题 / 80

中国文学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国文学中的想象问题》补义 / 87

中国文学欣赏的一个基点 / 92

中国文学讨论中的迷失 / 96

中国文学中的气的问题——《文心雕龙·风骨》篇疏补 / 104

《文心雕龙》的文体论 / 145

《文心雕龙》浅论之一——自然与文学的根源问题 / 210

- 《文心雕龙》浅论之二——《原道》篇通释 / 216
- 《文心雕龙》浅论之三——能否解开《文心雕龙》的死结 / 222
- 《文心雕龙》浅论之四——文体的构成与实现 / 228
- 《文心雕龙》浅论之五——《知音》篇释略 / 233
- 《文心雕龙》浅论之六——文之枢纽 / 241
- 《文心雕龙》浅论之七——文之纲领 / 251
- 陆机《文赋》疏释 / 258
- 从文学史观点及学诗方法试释杜甫《戏为六绝句》 / 302
- 皎然《诗式》“明作用”试释 / 330
- 环绕李义山(商隐)《锦瑟》诗的诸问题 / 335
- 韩偓诗与《香奁集》论考 / 395
- 西汉文学论略 / 428
- 宋诗特征试论 / 455
- 赵冈《红楼梦新探》的突破点 / 489
- 我希望不要造出无意味的考证问题——敬答赵冈先生 / 515
- 由潘重规先生《红楼梦的发端》略论学问的研究态度 / 522
- 编后记 / 541

传统文学思想中诗的 个性与社会性问题

一、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毛诗·关雎》前面的序，世人称之为“大序”，其他各诗前面的序，一般称之为“小序”，合而称之则为《诗序》。这里不涉及《诗序》的作者、价值等问题，而只就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对大序“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解释，来看在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中，如何解决一个文学作品的个性与社会性的问题。至于《正义》的解释，是否和大序那句话的原意相符合，这里也置之不问。所以我泛称之为“传统文学思想”。

没有个性的作品，一般地说，便不能算是文学的作品。尤其是文学中的诗歌，更以个性的表现为其生命，这在中国过去，称之为“志”，称之为“性情”。诗人所咏歌的，当然有其外在的对象、客观的对象，但仅把自己对于客观对象的认识加以叙述，不会成为诗歌的作品，即使把主观对于客观对象的感想、愿望，通过诗的形式表达出来，只要主观与客观之间，存着有空间上的距离的感觉，其距离那怕像“执柯以伐柯”那样近，依然不能成为一首好诗。真正好的诗，它所涉及

的客观对象，必定是先摄取在诗人的灵魂之中，经过诗人感情的熔铸、酝酿，而构成他灵魂的一部分，然后再挟带着诗人的血肉（在过去，称之为“气”）以表达出来，于是诗的字句都是诗人的生命，字句的节律也是生命的节律。这才是真正的诗，亦即是所谓性情之诗，亦即是所谓有个性之诗。

大凡有性情之诗、有个性之诗，必能予读者以感动。因为有这么一种感动力，于是而诗的个性，同时也即是它的社会性。但诗人的个性，究系通过何种桥梁以通到社会，因而获得读者的感动，使一个作品的个性，同时即是一个作品的社会性呢？《正义》对于这，有很明显的解释：

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故谓之风。……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谓之雅。

按所谓“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即是发抒自己的性情，发抒自己的个性。“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国之心”，这是说作诗者虽系诗人之一人，但此诗人之心乃是一国之心，即是说，诗人的个性即是诗人的社会性。诗人的个性何以能即是诗人的社会性？因为诗人是“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即是诗人先经历了一个把“一国之意”、“天下之心”，内在化而形成自己的心，形成自己的个性的历程，于是诗人的心、诗人的个性，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心，不是纯主观的个性，而是经过提炼升华后的社会的心，是先由客观转为主观，因而在主观中蕴蓄着客观的，主客合一的个性。所以，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精神总是笼罩着整个的天下、国家，把天下、国家的悲欢忧乐凝注于诗人的心，以形成诗人的悲欢忧乐，再挟带着自己的血肉把它表达出来，于是使读者随诗人之所悲而悲，随诗人之